

八二自述
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到了马良山
不朽的人民战士
通祭许老
默默者之歌
追记林草
故旧杂忆
室中诸友
从与作者20封通信想到的
要重视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编写工作
书评七则
编辑工作三十年
常见字词正误

胡汝骏 著

编辑工作三十年



NLIC 2970700799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甘肃教育出版社





胡汝骏 著

编辑工作三十年



NLIC 2970700799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编辑工作三十年 / 胡汝骏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23-2444-3

I. ①编… II. ①胡… III. ①编辑工作 — 文集 IV. ①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5721号

责任编辑: 白 鑫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编辑工作三十年

胡汝骏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190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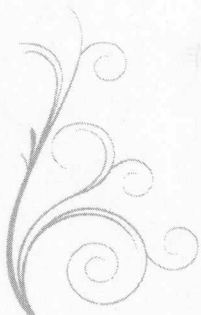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23-2444-3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 1 八二自述
- 12 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到了马良山
- 15 不朽的人民战士
——记为抢救居民而牺牲的战士蒋达坤、吕成方
- 18 遥祭许老
- 23 默默者之歌
——记林草
- 26 追记林草
- 30 故旧杂忆
- 34 室中诸友
- 38 从与作者20封通信想到的
- 40 要重视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编写工作
- 45 我与《论美》
- 49 《人类生态学初探》读后
- 51 中外攀登者的足迹
——读《成功之路》

- 53 老师、导游者、知心朋友
——推荐《中外名人格言精华》
- 55 中华文明的足迹
——推荐《中国历史上一百个故事》
- 57 时间运筹与成才
——推荐《中外成才者的足迹——时间运筹纵横谈》
- 59 一本优秀的社会学通俗读物
——推荐《社会学问答》
- 62 编辑工作三十年
- 71 常见字词正误
- 215 附录：政治理论编辑室历年获奖书目
- 221 编后



八二自述

我于1927年1月出生，陕西韩城市人。现年82岁（2010年）。1949年2月毕业于东北大学中文系。同年3月参加工作，5月参军。有7年时间，在部队作新闻工作。编了600多期报纸。撰写了300多篇社论、短评、通讯报道。其中，1952年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祖国人民的使者来到马良山》和登在《志愿军报》上的《反抗道战的政治工作》，在部队引起较大的反响，荣立二等功，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1953年采写的《不朽的人民战士——记为抢救居民而牺牲的战士蒋达坤、吕成方》登在《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上，部队六大军区级报纸全文转载，并发了社论、短评。1956年底到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1960年10月任政治理论编辑室副主任，1973年12月任主任。1987年7月，被评为编审，年底离休至今。

一、我是一个兵

1949年3月，我在北京参加革命。这年5月，报名加入四野南下工作团。不久，我们唱着“我们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永远前进！”的团歌，到河南开封，经短期学习，准备南下。我写了报道《我们是怎样准备走向征途的》，登在《河南日报》上。再不久，全南工团各大、中队成万人，到武



雄纠纠，气昂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汉渡江奔赴所分配的单位。我们这个中队，经湖南常德、益阳、长沙、郴州等地，尾随部队向广西前进。1950年6月，我正式分配到解放军某师《战旗报》当记者。当时，我穿着一双空前绝后的破旧鞋子，报社主编找来一双36码的新布鞋叫我换上。这是我参加部队上的

第一课。1950年10月19日夜，我们四野4支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去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离开祖国，过鸭绿江大铁桥，从白天敌机炸过的新义州的硝烟火光中，疾速而过。部队在朝鲜北部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辗转走了近10天，于10月底，初试利刃，一举打败了敌人一个团，歼灭美军五百多人，其余的敌人扔下4架飞机和无数辎重、汽车逃跑了。我军又乘胜追击，过清川江浮桥，蹚过齐胸的大同江，于12月31日，解放了平壤。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这时的平壤，已成了一片瓦砾。它使我认识到，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和平。部队再经过紧张的备战，分多路突破临津江，直达汉城东北的釜谷里。这个地方，有五六个山头，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是汉城前沿的咽喉门户。我所在师347团一个营首先占领了它。战斗最紧急关头，我方伤亡很大，敌人一批又一批冲向山头，钢铁连司号员郑起，眼看阵地不保，急中生智，拿起他的冲锋号，嘟嘟地吹了起来。胆怯怕死的美国鬼子，以为我们的援兵已到，稀里哗啦地溃退而去。我们胜利了！1951年春节，我们解放了汉城。我们这支部队，是以打攻坚战著称全军的铁军。各团的“先锋连”“尖刀连”“钢铁连”“爱民模范连”等旗帜挂在自己的俱乐部里。其中，346团这个战斗集体，战斗作风最快、最硬。上级有什么艰巨任务，他们总是抢先拿去。战士们有个顺口溜：“三六打，三七看，三八吃闲饭。”而347团、348团的战士则十分不服气，

反击说：“比一比战斗功臣，看谁最多。你们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的靳文卿、王凤江吗？”

在我们部队指战员中，有这样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原来的师长钟伟，外号钟小个子。在东北解放战争“三下江南”的一次战役中，他未按照上级的部署行动，而是自作主张，抓住战机，一举消灭了敌人一个团。人们担心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钟小个子，最少要受严厉的降级处分。可结果呢？“东总”却通报全军表扬，号召大家学习他这种主动作战的魄力和作风。又是这个钟小个子，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一次以批判彭德怀为内容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诬陷彭总，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毫不含糊地说：“此事我在场，与彭总无关。”以后他的际遇，可想而知。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诬陷彭总的事得到澄清，证明钟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言行完全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党的军队高级将领应有的高贵品格。他平反后，任北京军区参谋长，1984年逝世。在我们部队中，有一双巧对儿，一个叫高山，一个叫流水。他俩都是从小在军营当娃娃兵，经过残酷的战争洗礼磨砺，迅速成长为军政领导干部的。前者18岁当团长，后者20岁当团政委，而指挥作战和政治工作做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感到最幸福的是有千千万万的祖国人民作后盾。正如彭德怀同志所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朝鲜前线，我们经常从军邮那里，收到成麻袋的慰问信、慰问品。其中有绣花枕套，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做工扎实的千层布鞋，写着金红大字的“赠给最可爱的人”的红绸大幅，等等。1952年秋，祖国人民慰问团到达了马良山。当慰问团到达马良山前线时，这儿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指战员们在热烈欢迎、招待慰问团的同时，都在那儿精心计划着“要以战斗的胜利作为迎接慰问团的礼物”！在一个阵地上，前沿的战斗打响了。这是一个黑天，照明弹照得满山通亮，红色弹道掠过夜空。而后，枪声沉寂了，光亮熄灭了。这时祖国的代表们在这个阵地上，亲眼看着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们的英雄姿态和获得的伟大胜利。成批的俘虏被带下来，成堆的战利品被背下阵地。当时我们身处那种战争环境，战斗

残酷，生活艰苦，什么样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大家认为最完美幸福的事就是在汗流浹背，嗓子冒烟的行军途中，有一口清水喝；身上米袋子里有几斤大米，战斗空隙能有较长几天休整时间，美美睡他个好觉。而最烦人的是空中天天有嗡嗡的敌人的侦察机叫声，然后不断引来战斗机“杀手”。有一天，我们师政机关暴露了目标，一群敌机发动空袭，机关炮、重磅炸弹接踵而来，对驻地的军民实行轮番轰炸。结果，代号780的师政治部副主任王泉同志牺牲了，文化科科长王庚南和其他20多位同志也牺牲了。王泉同志，陕西礼泉人。他上小学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后暴露身份，组织护送他当了兵。从副排级而至师政治部领导。他的母亲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地挖去双眼。他将自己的母子深情转移倾注到我们这些下属身上。我们报社只有三个人，主编王春祺，要兼顾科里一些事；我是编辑兼记者；另外一名马甦同志，管报社的编务、通联和吃喝拉撒等杂事。我晚上跟部队行军，白天要下连采访英雄事迹。回来编稿子，弄版面。常常忙到夜里十一二点，还要到油印组校对清样。然后，才去地铺上呼呼大睡。有一天，王泉同志对报社主编说：“好呀！我昨晚上查铺，小胡做梦也在编报，要在机关人员周末大会上予以大力表扬。”王泉同志写了一篇《阿妈妮的来信》，歌颂一位朝鲜老大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深情厚谊的故事，登在当时国内的名刊《新观察》上。王泉同志的灵骨以后安葬在沈阳北陵烈士陵园。1952年底，我调至朱德元帅题字的军《立功报》工作。因工作关系，我对原师长，当时已为军长的汪洋同志有所了解。汪洋同志，皮肤白皙，大个子，是个武将，又是个儒将。他于指挥战斗之余，常爱吟咏诗词歌赋，爱舞文弄墨，写一笔好字。他不喝酒，不抽烟。有时候和机关宣传队男女同志跳跳舞。他28岁当师长，30多岁当军长，在军里是一位令人尊敬羡慕的首长。有些女同志和他套近乎，想成他的眷属，他婉然拒绝。有一天，我们报社来了一位新手，香港某大学中文系学生。她虽然穿上军装，仍不脱洋大学生的习惯，开口“谢谢”，闭口“对不起”。报社的电话坏了，通讯连派战士来修。她给战士客气地端茶倒水，战士没见过这种场面，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竟冒出一句：“不喝，我不会喝水！”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代号801的汪洋同志的未来伴侣

周湘玖同志。前不久，我和报社一块工作过的李键羽同志联系，得知汪洋同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冲击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官至北京军区副参谋长。他和老伴周湘玖同志著有《勿忘庐人家诗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汪洋同志于2004年逝世。

1953年3月，我们这支铁字号部队回国。车过鸭绿江桥时，我想起了1950年10月时的情景：新义州的满城硝烟火光，后来马良山前线和敌人拼手榴弹的宫玉福同志，面目亲善的王泉同志。我掐指计算，我们这些出国时分布在各师、团、营、连的青年知识子，80人中已有10多位永远把生命和鲜血贡献给朝鲜那块土地了。回国后不久，我因积劳成疾，住到锦州解放军医院。我的那一半张潜英同志，几次到医院看我。她谈到从1946年我们结婚后的7年情况：韩城解放初期，家里没牲口，她拉犁耕田种麦。和她睡在一起的解放军女干部给她讲革命道理，恳切向她建议：“走出家门，上学学文化知识，作一个独立的新中国女性。”于是，她决心进妇女识字班，而后上小学跳了几级，吃的是白开水加自带的干粮，找



《立功报》编辑归国前在战地留影

两毛钱的课本费都很难。为了练好字，没钱买纸，她用手指头在沙地上划拉，手指头磨出厚茧。到了六年级，这样的生活也难以继。我的小学老同学，这时她的老师丁振声、高中岳、韩春生凑钱帮助她，使她不至于中途辍学。我听了内心不是个滋味，而丁、高、韩都已不在人世，我已无法还清这笔人情义债，心中怆然，良久歉疚不已。

二、稿山脚下度春秋

我的业务经历，先新闻后出版。除了“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荒疏外，有幸能将自己的大半生心血献给党的出版事业。我淡泊名利，潜心编书。悠悠数十个寒暑，都是在“稿山脚下”、写字台前度过的。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有苦亦有乐，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经历的过程是漫长而又曲折的。长期的政治理论编辑生涯使我深切地感到：在政治理论这块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真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上，要能胜任本职工作，必须牢牢把握出书方向，要有长远打算，能够系统地提出成套出书和和组织重大选题的规划和措施，抓编辑工作的“重点建设”；要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及时排除各种干扰，较好地编辑工作中贯彻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要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勤勉从事，日积月累，及时总结提高，使自己具有较高的鉴别审稿能力和较强的文字加工修改能力。过去，我们政治理论工作，走了一段弯路，出书的路子非常之窄。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编辑工作碰到极大困难。“书稿难编，读者不买”，真是“山穷水尽”。其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决策，使我们的编辑工作获得新生，把我们引进了“柳暗花明”的境界。我们认真学习，加深理解。总结了经验，解放了思想，决心自励求新。首先，明确了政治理论出书的方向，端正了指导思想。为什么过去出书的路子非常之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保留书目甚少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政治理论书稿的性质和任务认识模糊，存在片面观点。在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上，在政治思想性和科学知识性的关系上，在内容的取舍和出书形式上，囿限于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这样，出来的书，板着面孔说教。无怪乎一个时期读者不买账。于是，我们下决心把以往片面追求数量，简单地配合中心，内容单一枯燥的出书转到控制数量，狠抓质量，扩大出书范围，讲求社会效果方面来，实现编辑工作的“大转弯”。其次，在措施上，将年度计划压至最低限度。

明确提出“每个编辑每年编一两本好书，物色三五个有水平的作者”的要求。这样实践的结果，发稿由1977年的42种，压至1978年12种、1979年的11种。但却出现了有一定特色的《逻辑学》和比较受读者欢迎的《常用典故注释》。在此基础上，编辑室于1980年又提出系统组织成套书和重大选题的规划，“力争有较多的保留书目”的奋斗目标。这些套书的要求是：学术著作和高中级读物，要有理论上的科学系统性，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供一般读者，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政治理论和思想修养读物，要有健康的知识趣味性，能够吸引人，不亦步亦趋地步人后尘，努力创造自己的出书特色。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室同志协力同心，积极参加学术和社会活动。物色作者，组织稿件，抓紧编辑和出版。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组织了6套丛书，共85种。它们是一套学术著作和大专教材。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工科教材），注意了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系统阐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有一定的实践深度，而《普通心理学》有不少新内容、新见解，并探索了当时心理科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受到专家的好评；一套思想史，其中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一套工具书，其中的《伦理学辞典》，是国内的第一本；一套文献资料，其中的《经济法资料》，受到专业工作者的重视；一套问答形式的政治理论、社会科学读物，其中《社会学问答》和《法制问题解答》，或选题有特色，或内容充实，或通俗易懂；一套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我们考虑的出书重点之一。在此以后，又编辑出版了一些思想性和知识性兼备的书稿，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有我们自己特色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这些年，由于书稿的质量提高了，路子比较宽了，保留书目的数字迅速增加。重印重版书由1979年的1种，1980年的2种，增至1981年9种。1982年重印再版书12种，占全年发稿计划的60%。书稿的总印数也多了，在经营核算上由以往的吃大锅饭，年年亏损，到后来几年的略有盈余。对于政治读物我们一直抓得较紧。我认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及时研究分析读者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选题，组织稿件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政治理论编辑的重大职责之一。1977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会后，我很快找来作者给出题目，编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答》。1980年春夏又出版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书，社会效果都比较好。

编辑的中心环节是审稿。对于审稿，我要求自己严肃认真，不能马虎从事。经过长期的实践，我总结出两句话：“评价稿件要切当，处理意见要明确。”一部好稿子，即使达到采用标准，如何“锦上添花”使之更臻于完善；一部有缺陷的稿子，如何“雪中送炭”，在质量上予以提高，给作者谈稿子，或填写复审意见，质量评价，存在问题，处理办法，都要再三考虑，尽量明确具体。如在《普通心理学》《论美》《成功之路》、《人类生态学初探》和其他一些书稿中，我均就自己的学识水平和管见所及，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均表示赞同。历年来，我的编辑工作，归结起来，有两点认识和粗浅体会：

1. 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编辑指导思想。

要做好编辑工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编辑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全室同志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明确了编辑指导思想，端正了出书的方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到过去我们的书稿质量不高，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出版工作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解存在片面观点。这样，出来的书，当然没有生命力。为此，我们下决心端正出书的指导思想，把出书转到控制数量，狠抓质量上来，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质量的措施。如1978年提出“每个编辑每年出一两本好书，物色三五个有水平作者”；1980年长沙出版工作会议后，提出组织系列成套书和规划重大选题；1983年学习24号文件后提出“六”“八”“十”“一”（6本工具书、8套丛书、10本青年读物、1本大型重点书）的奋斗目标。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措施较为得力，出书质量不断提高，初步有了一些我们自己的“看家书”。如《成功之路》和《成才者足迹——时间运筹纵横谈》等5本书被评为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和青年优秀读物一、二等奖，《工业心理学漫谈》被评为全国科普创作一等奖，《中外名人格言精华》等六本书被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管理心理学》被评为全国社科十大畅销书之一，《实验心理学简编》等3本书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高校文

科学学术著作,《人类生态学》等4本书被评为北方13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毛泽东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部分》《社会学简明辞典》等10本书为全国出版的第一本该类图书。

2. 提高书稿质量的几点作法

(1) 要特别强调选题工作。1983年,我们参加了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评选。以后,我们又参加了团中央的三次青年读书活动推荐评选、全国青年优秀读物评选、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评选。由于在选题上下了工夫,效果都不错。从此,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选题功成一半”。在我们甘肃,要和兄弟社竞争,选题尤显重要。可以说,目前出版社的激烈竞争,首先表现在选题的竞争上。我把政治理论编辑室历年的再版书71种和评选、推荐、被翻译的以及教材等72种图书,从选题角度做了个分析,感到搞选题要抓四个字,即“早”“缺”“远”“大”。“早”可以加强选题的预见性,先走别人一步;“缺”可以加强选题的新鲜感,缺为贵嘛;“远”可以加强选题的远际效果,使之富有生命力;“大”可以加强选题的威慑力量,使之有声势。通过几年的实践,我认为要搞好选题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充分认识选题在编辑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要明确制定选题的根据,包括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调查读者动向、信息收集与反馈等;第三,责任编辑与搞好选题关系重大。一个责编是选题的“导演”和“设计师”,要具有获取选题的有关知识,鉴别、摄取选题的方法,经常要进行选题分类,总结选题的优势与失误方面的经验教训,要积累自己的选题代表作,要给选题起个好名字等。

(2) 要强调书稿中的“三性一新”。三性即政治思想性、科学知识性、健康趣味性;求新,即有新意。关于书稿的政治思想性,我一直抓得比较紧。1987年后,我们组织的贯彻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三部通俗理论书稿效果都比较好。关于书稿的科学知识性,我们比较重视科学系统性较强的学术著作和大专教材以及知识性较强的多学科基础读物的编辑出版。这些书,由于知识跨度大,对多层次读者起作用,发行效果都比较好。关于健康趣味性,我认为要强调健康二字,要格调高雅,不能流俗媚俗,贻害读者。我们在编辑出版《中外

成才者足迹——时间运筹纵横谈》《中外名人格言精华》《中外名人轶事录》等书稿时，我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关于求新，即千方百计力争书稿中有新意，



作者在查阅资料

求新出新，创造出自己的出书特色来。在这方面，我们的做法是：第一，敢于出新，打掉自卑感，敢于和兄弟出版社争个上下；第二，巧于出新，我们主要抓了一些缺门、冷门、新学科、边缘学科、思想教育几个空档；第三，抓早一点，如《人类生态学初探》《毛泽

东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部分》和逻辑学、心理学、法学、工具书等方面的书稿，出得比较早，因而在全国有一定竞争力；第四，如果别的出版社已经出了的，我们要么不出，要出就要有自己的特点，如《逻辑学》，当时有两本，我们强调材料的新颖和权威性，《中外名人格言精华》，此类图书当时全国已有七八本，我们强调要编得精当，书名也要突出精华二字；第五，形式上要创新，我们尝试用较强的政治思想内容和文艺形式“相结合”的办法编辑了一套青年思想修养杂文集子，效果也比较好；第六，封面、装帧设计、用料、工艺都讲究些，工于其事，从整体上提高图书质量。我从“三性一新”角度，剖析了政治理论编辑室143种书稿，发现了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一是凡是“三性”较强的，一般生命力较强，往往多次印刷，成为畅销书或常销书；二是凡是有新意的，就对读者有较强的吸引力，读者比较欢迎；三是凡是编写形式生动活泼的，就容易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效果也比较好；四是凡是封面好看，印制精美，整体质量好的，效果也会很好。

（3）要精心培育队伍。我在作者队伍建设中，联系了一批大专院校教师、报刊编辑、理论宣传工作者和自学成才的骨干作者。我物色作者的条件：一是

写作态度端正，为人好；二是要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学科知识素养；三是文字修养较好。根据这些条件，联系一个算一个，不滥竽充数。多年来，我联系约100多名作者，比较重视对年轻作者的发现和培养，多方为其“开路”。如对《社会学问答》作者刘坚承，《成才者足迹》作者李光伟的扶植，曾花了不少心血，使之很快成长。在1986年全国青年优秀读物评选中，李一人有两本书获奖，影响较大。对于编辑队伍，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除了在制定选题计划、审阅重点书稿、练笔写作著文、总结工作经验中，帮助编辑出点子，进行传帮带外，同时注意发挥全室人员的积极性，均收到一定的效果。另外，我还比较重视积累资料，总结经验。1982年，我撰写了《要重视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编写工作》。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同年第10期《新华文摘》予以转载。鉴于日常原稿中错别字太多，我整理了卡片475张，1049组，2914字，编写了《常见字词正误》，共计10万字，已经出版。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为此书作了序。

1982年中宣部出版局《情况反映（33）》中，以《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开创政治理论编辑工作的新局面》为题，介绍了我的工作体会。1986年，该文又被刊载于由中宣部编、展望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家列传》中。在图书宣传推广工作方面，我撰写了140多篇通讯、书评，其中如《当代科研面临的重大课题——读〈人类生态学初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出版系统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总之，我认为书稿质量好坏的问题。是关乎一个出版社信誉高下，塑造什么形象的问题，是关乎制造什么样的精神产品，是否对社会负责的问题，是关乎编辑队伍如何培养提高，能否迅速成长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编辑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都认真贯彻党的“双为”出版方针，把提高书稿质量问题摆在首位。

2010年11月

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到了马良山

10月14日夜里，祖国人民慰问团到达了马良山前线。

宣传队的女同志捧着从山野里采来的鲜花，乐队敲锣打鼓从前沿赶来，从工作室里跑来的同志和背着自动枪的战斗队伍汇合在一起，唱着歌儿，喊着口号，把代表们高高地抬起来了。一个个健壮的手臂伸向他们，谁都想和代表握握手，说句话，问一问祖国的好。虽然是深秋，山风夹着细雨，但是人们头上冒着汗，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和幸福。



志愿军指战员热烈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

第二天，守卫在马良山的志愿军某部功臣代表、直属队的机关干部和慰问团联合举行了欢迎、慰问大会。穿着新衣，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的队伍，向祖国人民的代表献花、献词致敬。部队长用几个数目字当做欢迎慰问团的献礼。他说，在马良山3个月的守备中，歼敌6200余名，击毁击伤敌机85架、坦克72辆。